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學術會議）

參加 2019 亞洲教育與國際發展學術研討會報告

服務機關：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學系

姓名職稱：余一鳴　教授

派赴國家：日本

出國時間：108 年 03 月 25 日至 108 年 04 月 01 日

報告日期：民國 108 年 04 月 10 日

摘要

本次透過科技部經費補助方式出國(日本、東京)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目的在於提升研究能量及吸取國際經驗，期望研究與國際接軌。本次參與 2019 第十屆亞洲藝術與人文學術研討會及第五屆教育與國際發展學術研討會，以「A favor for a favor the rationalization of misappropri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in Chinese societies」及「The transforming of how the Taiwan military views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China as friend or foe」為題參與學術論文發表。會議期間與各相關的學者分享個人的研究成果及心得，同時，亦有相關的學術針對相關研究主題進行討論，由於該研討會係屬於跨科際間的學術研討會，因此，會議期間除了與相同學術背景的學術進行問題探討，亦透過該研討會瞭解目前不同學科發展的趨勢，提供不同的研究視野，吸收不同的專業知識，有助於報告人未來研究之進行與精進。

目次

一、 目的 \4

二、 會議議題重點內容 \4

三、 過程 \6

四、 心得 \6

五、 建議 \9

六、 報告內容摘要譯文及活動記要\ 10

一、 目的

第五屆亞洲教育與國際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The 5th 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CEID）及亞洲藝術與人文國際學術研討會（The 10th Asian Conference on Arts and Humanities; ACAH），兩個國際學術研討會，雖然不是在各學術領域專業的研討會，但由於研討會的內涵包含較廣，有助於學者進行跨科技的學術交流，吸取不同學科的研究經驗與觀點，以充實個人學術視野的侷限。同時，也藉由國際學術交流之機會，廣徵研究意見，做為日後研究投稿的改進依據。

二、 會議議題重點內容

(一) 亞洲教育與國際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大會主題為「獨立與相互依整，主要在於探討各種文化隔閡與通訊科技帶來的社會與文化的變革，它除了指傳統文化與文化間的隔閡之外，更進一步的將概念擴及到世代、身份與宗教等領域，研討會的主軸即在於探討在面對這樣的時代特性，我們如何自處，如何透過網絡世界去理解與學習不同的文化，如何積極參與全球化，避免隔閡與異化。雖然該論壇以教育學門的學者為主，但由於內容相當多元，而且不同領域的學者，多少都負有教學與知識擴散的任務，因此，與會學者除了教育學門的學者之外，還包含：人類學、科技教育、文化研究及倫理學等有關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門都包含其中。也由於這些人的參與使得會議的內容呈現相當多元，提供與會學者同的研究思考，有助於各學門及科際之間之交流。會議中邀請了多位各學門的重量級人主進行演講，內容包含日本人權教育訓練中心主任 Yozo Yokota:「教育人員與流離失所者:日本政府援助難民計劃的個案分析」

（Education and Displaced People: The Case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roject to Assist Refugees）、日本大阪大學國際公共政策學部(Japanese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Haruko Satoh 教授：「渴望與現實之間:大學課程的文化衝突」（Between Aspiration and Reality: Cultural Conflict in a University Classroom）、日本國際合作局 Naoki Umemiya 教授：「獨立與相互依賴:跨境教育合作」（Independence and Interdependence: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cross Borders）等。

(二) 亞洲藝術與人文國際學術研討會

大會主題為「開拓未來」(Reclaiming the Future)，主軸在於探討全球目前面臨的區域主義、民族主義與威權主義等問題，使得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與焦慮，呈現出政治分歧、不公平與不公正及社會秩序瓦解，形成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人與環境的衝突與緊張。這種現象不僅出現於意識形態、信仰與身分之中，更顯現於學術、媒體與藝術之中。會議中邀請了多位各學門的重量級人主進行演講，內容包含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 Yutaka Mino：「在博物館中培養審美觀」（Museums Cultivate Aesthetic Sensibility）、英國利物浦大學榮譽資深研究員 William Lindesay 教授:「述說長城:我們如何發現它」(The Great Wall Story: How I Have Discovered It）、美國西北大學 Bradley J. Hamm 教授：「開拓科技、媒體與社群的未來」（Reclaiming the Future in Tech, Media and Communities）等。會議內容相當多元，提供與會學者同的研究思考，有助於各學門及科際之間之交流。

三、過程

(一) 亞洲教育與國際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共進行三天(三月 25 日及 27 日)，第一天開幕茶會及與會人員報到及專題演講，下午則舉行頒獎及藝術類作品發表。第二至三天開始正式的各場次的議程，每天有 5 個發表時段，早場為 0915-045 為茶會時間，提供各與會人與意見交流，從 0945 開始到下午有四個發表時段 0945-1125；1140-1255；1215-1315；1400-1540；1500-1650，報告人被大會安排於第 1 天(25 日)上午 1600-1700。與會學者討論之內容請參閱下述心得。

(二) 亞洲藝術與人文國際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共進行三天(三月 29 日至 31 日)，第一天開幕茶會及與會人員報到及專題演講，下午則舉行頒獎及藝術類作品發表。第二至三天開始正式的各場次的議程，每天有 5 個發表時段，早場為 0915-045 為茶會時間，提供各與會人與意見交流，從 0945 開始到下午有四個發表時段 0945-1125；1140-1255；1215-1315；1400-1540；1500-1650，報告人也被大會安排於第 1 天(29 日)上午 1600-1700。與會學者討論之內容請參閱下述心得。

四、 心得

一般而言，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除有利於研究與世界接軌外，更有助於提升國際能見度。在此行中，報告人有幾點發現：

（一） 本人參與第一個研討會(ACEID)以「國軍對美、日、台敵對意識變遷分析」(The Transforming of How the Taiwan Military Views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China as Friend or Foe)為題，內容主要在於探討 1955-2015

年以來，國軍對這三個國家敵對意識的轉變。與會者認為以軍事期刊的內容為分析標的，會不會由於早期軍事期刊的學術性不高，多數為宣傳性的文意，使得文章的內涵並不能充份的反映當事人的觀點，當使用這些文章的內涵做為內容分析的標準時，就很可能出現分析結果的偏誤。顯見，這種過於本土性的研究，作者需要在相關的研究背景上，多加以說明，因此，未來投稿稿件宜加入這一部份的說明，避免引發不必要的聯想。

（二） 在第二個研討會當中發表人以「投桃報李:華人社會公器私用合理化心理」(A Favor for a Favor: the Rationalization of Misappropri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in Chinese societies)大部份的與會學者會認為台灣社會的研究是否可以推論到整個華人社會，與會者認為台灣雖然基本上以華人為主體，但長期民主化的結果，使得台灣的社會文化與價值與中國大陸有著很大的區隔，因此，以台灣的訪談結果做為整體華人公器私用合理化的推論，在樣本的代表性上容易被質疑。報告人在會場上的回應是，Jacobs 在 1980 年代曾經以此主題研究媽姐鄉的黨政運作，他發現台灣與中國大陸其他地區一樣存在著關係主義，雖然 Jacobs 近期再回到媽姐鄉研究時認為這個現象已不存在，但根據研究者的調查發現，這個現象還普遍存在於台灣社會，只不過民主化之後，這些都變為抬面下的行為，顯見民主化的確抑制了關係主義的運作，但並不是不存在，而只是轉為抬面下的運作，不會公開於外，這使得研究變為相對的不易。不過這也說明，台灣的案例正足以代表華人社會，因為如果連民主化後的華人社會都存在這個現象，那麼中國大陸更是普遍，而且以台灣的案例更具代表性。

換句話說，當台灣普遍民主化之後，公務員接受西方民主價值，公務員面對自己人或外人都要公平的使用公權力，不應有親疏之別，但他們又逃脫不了傳統

關係主義的約束，在兩股價值的衝突下，公務員如何面對自己人公器私用時合理化自己的行為。總之，台灣公務員所面臨的狀況，勢必也會在未來中國大陸出現，當中國大陸制度愈上軌道，法制逐步取代人治之後，必定壓縮關係主義在公務部門的運作空間，或是說影響關係主義對公資源分配之影響，那麼公務員如何在新舊價值衝突下執行公務，又如何在關係主義規則下有效推行公務，都涉及公器私用合理化的心理機制。也就是說，台灣的民主化造成公務員在面臨傳統價值與現代價值的衝突時，如果運用傳統關係主義價值推動公務，同時，又如何滿足關係主義的社會需求，做為未來支持公務推動的力量，可預見的未來都將是中國大陸公務員要面對的問題。

（三）雖然該研討會發表的內容相當多元，有助於跨域整合，吸取不同領域的學科觀點，但參加類似的研討會也有缺點，即與會的人並不是你這方面研究的專業，所以，較難以進行有效的對話。研討會中雖然有相當多的學者表示對發表人的論文有興趣，但發表的內容大概都是一般泛泛之論，當然，也偶有出現一般有趣的問題及建議，而這些建議詳細思索後，也不無道理。例如，發表人遇到一位以新聞專業為背景的學者，他就建議，作者第二場次的研究應該，用文字探勘的方式進行，相較於內容分析，文字探勘在效度方式較佳，而且研究掌握的好，也較內容分析處理簡效。雖然發表人，也曾經思索這個研究方式，但由於研究者無法獲取電子全文，所以無法藉由文字探勘的方式進行研究。因此，雖然本次研討會沒有辦法獲得太多專業上的建議，但有些跨學科的建議，的確值得思索。總之，類似的研討會似乎對未來投稿並沒有產生多大幫助，若發表之論文預計未來要投稿，想藉由類似(多元性)研討會蒐集修正之意見，可能收獲有限，但若只是個先導性研究，未來再持續研究時可以獲得更多不同類似的研究意見，則藉由該

類型研討會的參與來蒐集未來研究方向與方法之建議，則是可以考慮的方向。

五、建議事項：

在非西方國家當中，日本的科技成就相當亮眼，至目前為止有十位日本籍的諾貝爾獎得主，令人括目相待，更重要的是多數學者高等教育均在日本國內完成，顯見，日本除了固守其原有大和文化之外，仍能在維持傳統的脈絡當中發揮創造力。

(一)強化台日學術交流(同前次返國報告之建議): 報告人於多次出國歸國報告當中，提出強化台日學術交流的建議，本次返國報告雖然再次舊調重談，但報告人要再三強調的是，日本的學術研究能力源自於紮實的基礎教育，及實事求事的族群文化，反觀國內近十年學術界彌漫一股期刊上稿率，以投稿國際期刊上稿率來決定學者的值價，學者為求鞏固學術界的地位與資源，不得不加 publish game，演變為整體學界只重視數量，而不重質量的扭曲現象，為了能有更多的研究被接受，只追求新、速、實、簡的研究。日本學界反而著重於紮實與具深度的研究，而且些研究動則要花費數十年方見成果，也就是他們並不急於短期內展現成果，而是給予學者更多的時間與空間，而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使得每個人的研究結果都具有相當的學術分量(雖然數量並不多)。

(二)補助及鼓勵赴日留學(同前次返國報告之建議):當然前述之現象，並不僅止於台灣，在此次的研討會上也發現相當多的國家的研究，也有追求新、速、實、簡的現象，尤其東南亞新興國家。報表人認為這可能與該國的文化與經濟環境有關。因此，報表人建議不僅要透過發表與國際接軌，透過發表認識國外的研究現況與能力，但這樣可能還不夠。因為國際學術發表必竟只是短期的接觸，發表人

認為要培養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學者，宜借由日本事實求事的文化精神，才能夠改變學者在研究上的認知，強化台灣學者的國際研究深度。

六、報告內容摘要譯文及活動記要

(一) 亞洲教育與國際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譯文)

1.摘要

國際上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然而，軍隊的敵對意識也是隨著國家利益而轉變嗎?本文透過二個研究，探討國軍對於美國、中國及日本等三國的敵對意識變遷狀況及影響來源。研究一，以軍事期刊為分析標的，透過內容分析瞭解不同時期的敵對意識轉變狀況。研究二，則是透過 2013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調查」(TEDS)的面訪資料分析，軍人對美、中、日三國的喜好程度。研究發現不管任何時期國軍都將中國視為主要敵人，其次為日本及美國。然而，對中國的敵對意識強度有逐年的下滑。另外，一方面軍人與民眾在對日本的喜好程度有顯異差異，然而，隨著世代的變遷，研究發現軍人對於日本的偏好，主要是來自於世代的影響，而非族群意識。

2.前言

文字紀錄是社會科最常用的分析標的，就其文本特性而言，在分析手段又以內容分析為主體。然而，受到大數據資訊形態興起的影響，文字探勘成為分析文字資料熱門之技術。基本上，文字探勘是架構在原有內容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只不過受到海量資料特質的影響，原來由人力譯碼(coding)的工作，交由電腦處理，主要仍是依照內容分析編碼的原則進行，只不過譯碼的工作是透過程式的運算來處理，因此，最大的差異在於人力譯碼或交由程式譯碼，但譯碼的依據都是

依照編碼的原則進行。傳統內容分析主要是透過人工閱讀文本，再依據編碼的原則將資訊譯碼於編碼簿上，而這些工作在文字探勘中則完全由程式取代，交由程式來判讀(He, Zha, & Li, 2013)。一般而言，在內容分析的過程中，人工判讀有利於適時依據狀況而進行編碼簿的調整；反之，文字探勘的優點在於譯碼的過程中免於主觀判讀，所造成的信度威脅。

據此，本研究透過分析國軍敵我意識的過程，來瞭解文字探勘及內容分析兩種方式之優缺點。以下本文先就內容分析運用於國軍敵我意識分析為案例做說明，透過實例操作的方法瞭解內容分析在研究過程中的步驟，再說明文字探勘使用所面臨的問題，以此比較兩種研究方法在本案例研究各自的優缺點。

3.研究工具

文本性的研究，主要區分為質性的詮釋研究與量化的內容分析，由於本研考分析框架相對較為清楚，因此採取研究方法可採文字探勘或內容分析兩種作法。不過由於多數內容為非資訊化資料（四種刊物分別於 94 及 95 年陸續電子化），若進行文字探勘，則需要大量的人力行進紙本資料的數據化的工作，再加上編碼的類目不多，若進行內容分析則無需花費過多的人力資源。因此選擇內容分析做為文本的分析手段。根據研究之目的，研究主要區分為下列四項類目，分述如下：

(一)研究刊物：區分成陸軍學術月刊、海軍學術月刊、空軍學術月刊及國防雜誌等四種。

(二)研究國別：區分成美國、中國、日本的題目等三類。

(三)研究時期：以各時期執政者來區分成「蔣介石、蔣經國時期(1955-1988)」、「李登輝時期(1989-2000)」、「陳水扁時期(2001-2008)」、「馬英九時期(2009-2015)」。

(四)敵對意識：本類目在於瞭解作者對於陳述之當事國的敵對意識。研究者擬以兩個面向，敵意與友好來判斷敵對意識。而其中之敵對意識的判別，則是依據作者在陳述當事國所運用的正、反面情緒形容詞。意即，當作者陳述當事國是以正面的情緒字詞表達，則視之為對該國友好的象徵(如表 1)。反之，如果是以負面的情緒定詞陳述，則視之為對該國敵意的象徵。如果陳述的內容未涉及任何正、反面的形容詞，則視之為中立。例如，作者在陳述該國的狀況時，表達出反對、受威脅、抨擊等態度時。編碼者將之視為對陳述之當事國敵意的表現，實際的例子如表 3-1，作者陳述解放軍在南海軍事發展的狀況，其中談到解放軍在南海發展軍備，主要在於「應對中共及其他主權爭議國的軍事威嚇」，其中談到解放軍的軍事威嚇等負面的陳述，則視之為作者對中國存有敵意。反之，如果對當事國陳述時使用的是支持、誇獎、肯定等形容詞，則表示作者對於當事國，存在善意，此時碼編者則編為正面態度。實際的例子如表 1，作者在陳述美軍軍事的發展狀況，使用如「創造出輝煌戰果」等正面性的陳述時，則視之為作者對當事國持正面的態度。

表 1 國家形象類表

敵意	中立	友好
表達反對、受威脅、抨擊等態度。	事實陳述，不做任何情緒性的表態。	表達支持、誇獎、肯定等態度。

其次，除了進行上述正負面態度的判斷，還必須再進行正負面態度強度的判斷。當編碼者依據上述的類目分析的原則進行敵對意識編碼後，仍進一步判斷正面態度或負面態度的強度，當強度愈強，所給予的分數就愈高。例如(如表 2)，作者的負面態度只是提醒要「有所警覺」，則視之為+1 強度的負面態度，但如果強調的是要「防衛反制」，則視之為+2 強度的負面態度，意即敵視的程度愈高。

反之，在正面的態度上，作者只是提醒要「認同與好感」，則視之為+1 強度的負面態度，但如果強調的是要，「學習合作」，則視之為+2 強度的正面態度，意即友好的程度愈高。而在後續資料的分析當中，+2 是給 5 分，+1 是給 4 分，0 給 3 分，-2 給 2 分，-1 給 1 分，也就是轉換後的分數愈高，代表敵對意識就愈高，反之，敵對意識就愈低。

表 2 強度測量標尺

方向 強度	負面 (反對或抨擊)		中立 (沒有評價)	正面 (支持或讚揚)	
尺度	+2	+1	0	-1	-2
例句	防衛反制	有所警覺	中立性	認同與好感	學習合作
給分	5	4	3	2	1

4.研究程序

依據研究目的與類目，完成編碼表後，編碼員根據編碼表的內容進行練習，希望能夠透過多次的編碼練習，相互確認內容，增進編碼員與文章的「互動」，提升編碼員的敏感度，縮短編碼的完成時間，利於研究的執行，並藉以發現難以清晰了解的規則，對於類目的定義，以及分類的架構做先前的問題釐清，進而補充以及修正原有建構類目的不足，讓編碼表更臻明確，使編碼的過程順利。本研究共有二人參與，除研究者本身外另有編碼員一位，共同編碼員是政治系所相關科系畢業，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系碩士班一年級學生。研究者對於共同編碼員進行的訓練，主要針對本研究之相關判定方式及規則加以說明，使編碼員之間對於內容主題、類目的種類、分析架構及理論模式等方面都能有相當的認知，減少研究員與編碼員的思想歧異，讓大家有所共識，發生謬誤的機率也會相對減少。訓練完成之後，編碼工作即正式開始。

本研究的編碼表及編碼須知如附錄三、四，研究者隨機從陸、海、空軍期刊中抽出 150 篇文章進行實際的編碼，在編碼的過程中，研究者須協助確認編碼員對編碼表類目以及定義，具有正確的認知，並且，編碼員在編碼的過程中，對於編碼的內容若有任何不清楚或模糊的地方，必須馬上向研究者反映及求證，以釐清相關問題，避免降低編碼的準確程度。在編碼進行時，編碼員在研究國別以及作者的數量上發現問題，文章所談及的國家可能不只一個，可能同時有二個或三個，如「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下中國大陸的因應—以南海為例」、「中日兩國抗衡：美國的政策選項」；針對以上問題，研究者對於填寫的基準，則依據標題的主體，選擇單一國家登錄，前者主體為中國，後者主體為美國，則填寫國別為中國及美國。

5.信度與效度

為瞭解研究的信度與效度，本研究分析透過評分者信度與效標效度等方式，檢驗研究的可靠性。

(一)評分者信度

透過編碼員間的相互同意度，來瞭解研究之信度。為求分析內容達到足夠的信度，增加一位編碼員共同進行編碼工作，並針對上述三類型中的可複製性進行信度檢測，採取方式為編碼員間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檢驗過程中，研究者隨機抽取母體樣本 150 份，分別交由共同編碼員進行獨立編碼的工作，編碼完成後再加以計算其相互同意度與編碼員間信度，以檢視信度是否達可接受標準。依據上述所提供之標準，編碼員間信度落在 0.80 以上則視為可接受信度係數標準，本研究之編碼員間信度為 0.92，符合 Gerbner 文化指標的設立標準，顯示，編碼員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且達科學研究要求的標準。

(二)效標效度

我們以問卷的內容做為效標，瞭解內容分析的結果是否足以代表國軍對敵對意識，問卷主要是以國防大學指參及戰略學院的學員為對象，內容同樣是詢問受試學員，「我覺得日本是我們的敵人或朋友」強度一樣各有 1 及 2。同時，為了題目安排的先後造成干擾效果，區分 A、B、C、D、F 等先後差異等不同的問卷，例如，A 卷是先問中國，再問日本與美國，而 A 卷是先問美國，再問日本與中國，以此類推，以混淆題目先後可能產生對研究的干擾。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3，結果發現：不同分析方法對美、日、中的敵對意識程度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對中國的敵對意識為 $t(374) = .05$，$p = .95$。問卷調查法之對中國態度($M = 4.14$, $SD = .73$)與內容分析法之對中國態度($M = 4.15$, $SD = .96$)沒有顯著差異。對美國的敵對意識為 $t(226) = -1.29$，$p = .19$。問卷調查法之對美國態度($M = 2.20$, $SD = .87$)與內容分析法之對美國態度($M = 2.04$, $SD = .93$)沒有顯著差異。對日本的敵對意識為 $t(114) = -.92$，$p = .35$。問卷調查法之對日本態度($M = 2.83$, $SD = 1.05$)與內容分析法之對日本態度($M = 2.56$, $SD = 1.20$)沒有顯著差異。顯見，透過內容分析所得到的結果，與真實國軍的狀況一直，內容分析所獲得的國軍長期敵對意識具有一定的效度。

整體而言，研究符合科學研究的標準。

表 3 不同分析方法在對中態度上之 t 檢定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對中態度	問卷(N = 100)	內容分析(N = 276)			
	4.14(.73)	4.15(.96)	374	.05	.95
對美態度	問卷(N = 100)	內容分析(N = 128)			
	2.20(.87)	2.04(.93)	226	-1.29	.19
對日態度	問卷(N = 100)	內容分析(N = 16)			
	2.83(1.05)	2.56(1.20)	114	-.92	.35

5.研究結果

1.美、中、日不同時期的關注比率

從圖 1 中可以發現，不管是那個時期，國軍對於中國大陸都較為關注，其次是美國，再來才是日本，而且對中國的關注度相較於其他國家都有 60%左右，不過在李登輝時期，對日本的關注度的確有上升，但幅度並不高，且後續呈現關注度下降的趨勢；相對於對美國而言，在李登輝時期是下降的，降至大概只剩下 20%左右，而後續幾個時期則是逐步的回升到 30%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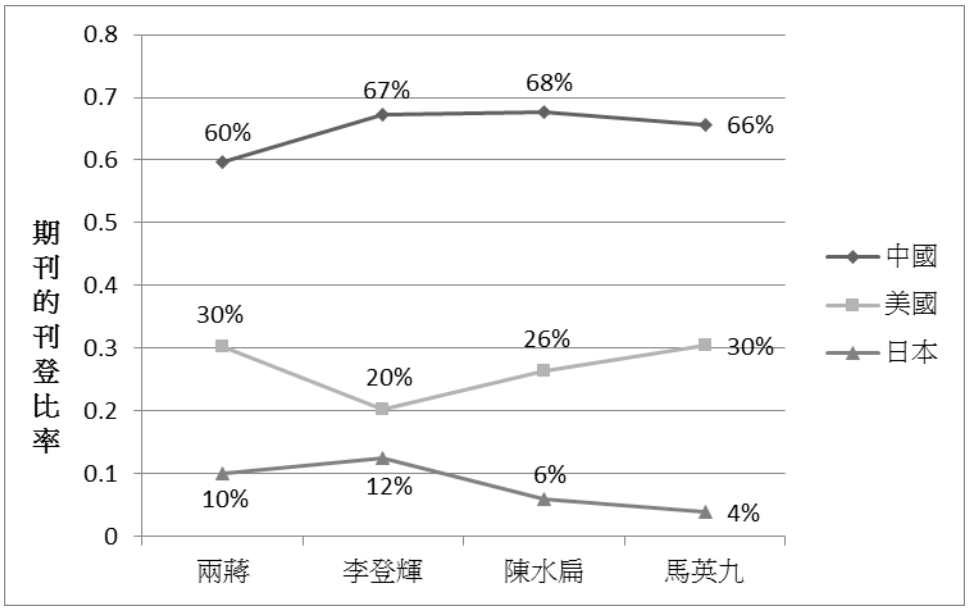

圖 1 不同時期美、中、日刊登比率

2.美、中、日不同時期之敵我意識高低

從圖 2 中可以發現，不管是那個時期，國軍對於中國大陸敵對意識都是最高，其次是對日本，最後則是對美國。就敵對意識的分數而言，3 分代表中立，3 分以上代表敵意，而 3 以下代表善意，敵意的最高分為 5 分，善意的最高分為 1 分。對中國大陸的敵對意識從兩蔣時期的 4.85，到李登輝時期的 4.54，陳水扁時期的 4.38，到馬英九時期的 4.15，顯示國軍在兩蔣時期對中國大陸具有高度的敵意，長期來看，雖然對中國大陸的敵對意識都是維持在 4 左右，但卻隨時間的發展而逐步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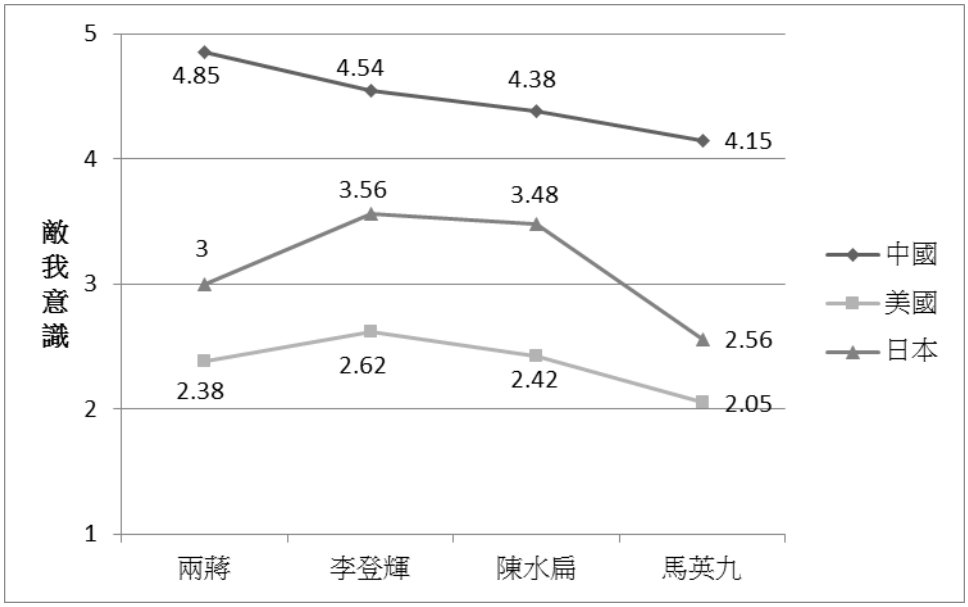

圖 2 美、中、日不同時期之敵我意識

透過圖 1 與圖 2 的比較，可以發現國軍對中共的敵對意識最高，同時也引起對中共發展及其相關活動的高度關注。雖然就長期而言，敵對意識有緩步下降的趨勢，但是相較於對其他國家的敵意，仍然相當的高。有趣的是對美日兩國的關注度與敵對意識似忽不像對中國那樣呈現正向的關係，即敵對意識愈高就愈關

注。這可能是由於國軍對於日本採取較為中立的態度(數值大概都在 3 左右)，所以國軍對日本的關注度就不如美國。反之，由於國軍對美國是處於友善的印象，因此，對於美國也會給予較多的關注。

6.會議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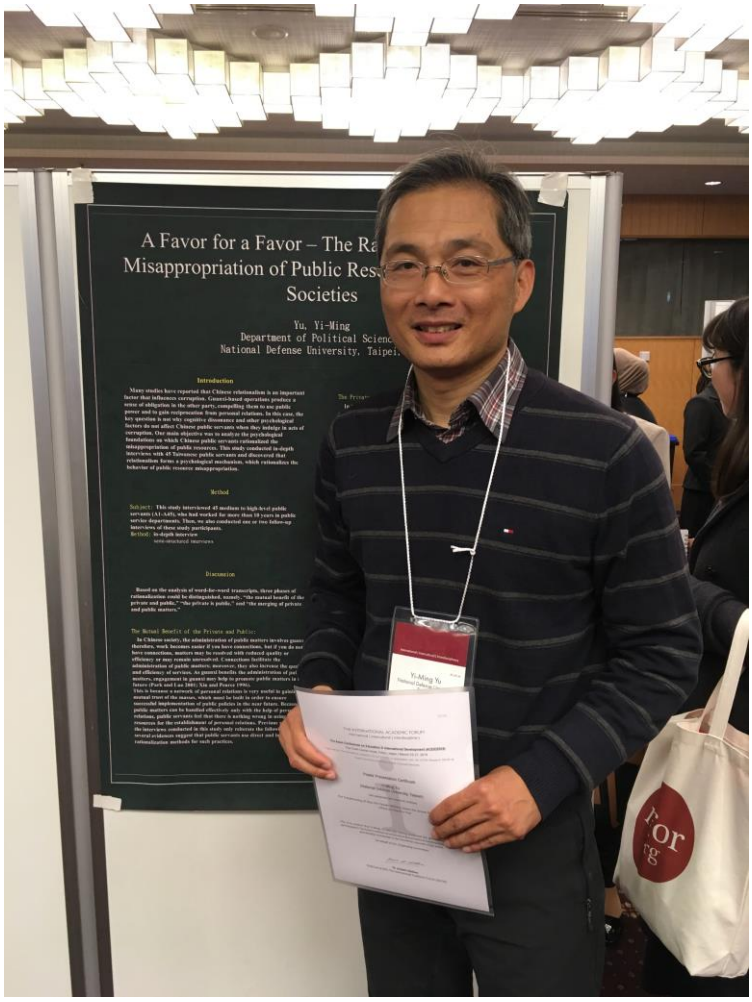

圖 1 Poster 的發表現場(國軍對美、日、台敵對意識變遷分析)

圖 2Poster 的發表現場與會者討論(國軍對美、日、台敵對意識變遷分析)

(二) 亞洲藝術與人文國際學術研討會概要

1.摘要

以往有相當多的研究指出，華人的關係主義是導致貪污重要的因素，主要是透過關係的經營讓對方產生虧欠感，使得對方必須使用公權力來進行回報，然而，為什麼華人公務員從事貪污時，不會受到認知失調等心理因素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什麼樣的心理基礎導致華人公務員可以合理化公器私用的行為。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 45 位的台灣公務員，發現關係主義會產生一種心理機制，來合理化公器私用的行為。結果發現，主要透過「公私互惠」、「私就是公」及「以公濟私」等合理化手段，來解化公器私用時產生的心理壓力。

2.前言

一直以來，文化被視為影響貪污的重要因素，但缺乏深入的研究(Méon & Weill, 2010)。檢視以往從文化的觀點探討貪污的研究，發現多數研究者將貪污現象，視為一種文化上的優勢，在傳統文化的價值觀當中，與貪污相容的價值觀具有高度的社會適應力，它鑲嵌於社會之中，成為社會的生活規範(如，de Sardan, 1999; Johnston, 1998)。例如，Johnston (1998)就表示貪污是一種文化現象，它不是一個單獨存在的孤立事件，許多國家發生大規模的貪污現象，並不是因為法制上的不完善，或是制度不夠成熟而產生在特定時期的混亂現象。貪污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的，交互鑲嵌於國家、市場和社會等領域之中，並與之形成共生關係。所以鑲嵌論認為，貪污就是內生於政治經濟體制之中，並與政治經濟體制共同構成相互依存的穩定的生態現象(H. Li, 2009)。因此，他們認為當現代社會期望藉由法律或制度性的手段來解決貪污之所以失敗，係由於新的制度或法規建構之時，舊價值會透過法律制定的過程，滲透到新的制度或法規之中，使得新的制度依附於舊的文化價值，即使在新的制度或法規制定完成後，也必須依附於舊有的文化環境下推動。因此，有相當多的研究指出，民主化未必能夠抑制貪污。

以往的研究也證實這樣的觀點，關係主義只停留在熟人間的運用，對文化有穩定效果。一旦關係外溢至外人或鄉里以外，將影響社會文化的穩定(Luo, 2008) 。因此，從價值的認同或社會穩定而言，關係主義主要在於以血緣為核心所構成的關係網，或是以鄉里為空間的地域中運作，躍出這個地域或網絡時，就會設法加以限制，以避免關係主義的運作對於公共領域帶來負面效應。由此可見，以往的研究認為關係主義透全面嵌入，而導致貪污的觀點並不全然正確。

既然，華人社會並不認同關係主義對公共領域的滲透，但為什麼公共領域又出現全面嵌入的現象。如果華人社會否定關係主義存在於公共領域，那麼當公務

員對自己人偏私時，如何克服認知失調所產生的心理壓力?關係主義之所以能夠鑲入於公共領域，是不是存在另一種心理機制，透過這樣的心理機制緩和因公器私用產生的心理壓力?據此，本研究聚焦華人公務員是如何將公器私用合理化，以排除內在心理認知失調的壓力。同時，藉由公器私用合理化的研究，以瞭解關係主義如何滲透至公部門，彌補鑲嵌論的理論缺口。

3.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做為資料蒐集的主要方法，由於關係主義隱含的道德價值規範，若採取問卷形式調查或觀察研究，容易引發公務員的防衛心理，作答的答案或行為表現將刻意朝向社會期待，因此若要深入的了解公私交換的脈絡，必須從公務員的心態著手，而質性訪談就是一種蒐集深層心理資訊有效的方法。Crabtree 和 Miller（2001）就認為研究的內容如果涉及到心理認知問題或是個人隱私，那麼將會影響受訪對象的個人內在判斷，因此這類研究以深度訪談最能夠引發受訪者分享親身經歷及內心感受，促使受訪者與研究者共同建構對研究主題的理解。

在訪談設計方面，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的訪談。Kvale 和 Brinkmann（2009）認為半結構式的訪談試圖從研究對象自己的觀點，理解人們日常生活世界，此種訪談尋求取得受訪者對生活世界的敘述，側重詮釋人們敘述的現象之意義。此外，半結構訪談是須聚焦於特定主題上進行的，既未嚴格的結構標準化問題，亦非徹頭徹尾毫無定向，而是藉由開放性問題，聚焦於研究主題上。本研究將使用半結構式的訪談法，也就以合理化的心理邏輯為主軸，由研究者訂定訪談大綱，再依此大綱於訪談中，運用受訪者達出的內容，做適度的延伸，使研究資料更為深入。本研究訪談 45 員服務十年以上的中高階公務員，並持續一到二次的追蹤

覆訪。

4.分析與討論

透過分析訪談的逐字稿，大概可以歸結出「公私互惠」、「私就是公」及「以公濟私」三種合理化的手段，分述如下:

一、公私互惠:

在華人的社會當中，辦理公務也需要透過關係，即所謂有關係好辦事，沒有關係可能無法完成公務，或完成的品質或效率不佳。反之，有關係不但可以辦好公務，而且有助於公務品質與效率的提升。由於透過關係有助於公務的辦理，因此，經營良好的關係，將有助於未來公務的推動(Park＆Luo, 2001; Xin＆Pearce, 1996)。同時，由於在華人的社會當中，推動公務往往需要私人關係的協助，動用私人的關係資源來協助公務的推行，那麼公家資源就有必要支援私人關係的建立。因此，透過動用公家資源來建立關係便具有合理性。

二、私就是公:

透過私就是公的策略，來合理化公器私用的行為，本研究將它稱為私就是公，而私之所以被視為公，是由於公與私的界線不清，甚至不存在公的概念，公共只是私人或是私人關係的集合，使得他們認為私人事務也是公務。持這類觀點的受訪者認為，公務資源與公務雖然是用於服務公眾，但由於在他們的認知當中公眾是私人的集合體。因此，服務私人也是執行公務。當他面對自己人給予較多的資源，或是給予自己人特殊的對待，這是由於自己人也是公務服務的對象，因此，他們並不會認為給予自己人特殊的對待有什麼不對。他們認為公務資源給予或分配，是公務員個人的裁量權。他們可以給自己熟識的人，也可以給不認識的人，不管給自己人或是給陌生人，都是依據職權合法的裁量，因此，給自己人或

是給陌生人，都具有合法性。

三、以公濟私:

第三類的受訪者並不是透過模糊公私的分界，來緩和公器私用的內在心理壓力。而是將運用公務資源來處理私人事務視之為助人行為，藉由道德化的策略來化解公器私用的心理壓力。由於幫助別人是一種善行與義舉，公共事務的推動最終的目標既然是尋求「善治」(good governance)，服務社會上弱勢或最需要被服務的人，這使得透過公務資源來協助需要幫助的人具有合理性。受訪者常以公共資源就是需要運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與最需要的人身上，才能發揮公共資源最大的效益。這一類型的受訪者雖然意識到公與私的區別，公共資源應該運用在謀取社會大眾共同或最大的利益上，但他們常以公共資源投入於幫助社會弱勢，或將資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就是謀取大眾最大利益，來合理化公器私用的行為。助人行為不僅具有公資源使用的合理性，更佔據道德上的優越性。因為助人是一種道德行為，既然是道德行為就不是為已，而是為了公，為了大眾的公益利益，而公益的行政行為，即符合公共政策追求之目標。因此，動用公共資源助人就是為大眾謀取最大利益。在幫助別人的合理化藉口下，動用公務資源來幫忙特定的人物便不存在公器私用的問題，而是一種助人行為。而且這種行為還會受到關係成員高度的讚揚(張志學 & 楊中芳, 2001)。總之，該合理化邏輯是透過助人行為的道德性，來克服公器私用的不道德性，以減輕心理壓力。

5.會議記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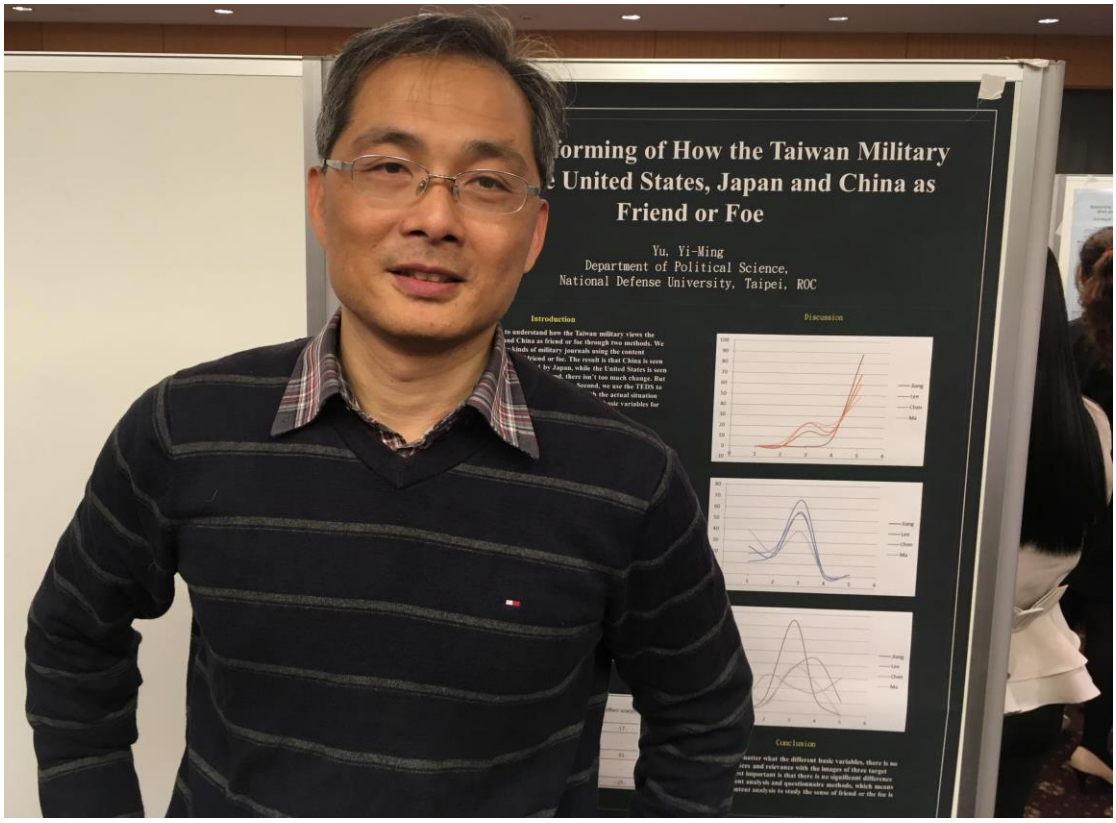

圖 3 Poster 發表現場(投桃報李:華人社會公器私用合理化心理)

圖 4 Poster 發表現場與學者討論(投桃報李:華人社會公器私用合理化心理)